

為，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態度到頭來是共同受害。我們要共同打這場拯救環境及資源之戰，以確保我們下一代有足夠條件去作持續的發展。

我們相信人類的智慧，我們相信人類的自我反省精神。我們雖已作出一些對環境不可挽救的損毀，但若能在科技、經濟等方面迅速及積極地去加以補救，對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就不應存着悲觀的態度。二十一世紀應是人類在經濟及環境系統重組的開始，一個新的規律應將在二十一世紀出現，這規律是要求各國在經濟、環境、人口增長各環節作一國際性的協調發展，在若干陣線上衝破國際界限，在全球共存的意念下，人與環境將會找到一個合理及健全的共生形式。

梁怡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學系高級講師

化解啓蒙心態

杜維明

植根於「啟蒙心態」的理性精神確為現代文明創造了許多涵義深刻的價值領域：市場經濟、民主制度、科學技術，乃至自由、人權、個體人格的解放以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信念，都是以理性精神為特色的西方人文主義的體現。作為「五四運動」的傳人，我們不論對傳統文化採取何種態度，都是西方啟蒙的受惠者。其實，理性精神業已成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文化傳統中的主流思想，這點無庸置疑。

不過，我們應該真切地認識到「啟蒙心態」只是理性精神的突出表現而已，其中因反對神學本體論而導致的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和因強調工具理性而產生的科學主義（scientism）都帶有複雜的心理情結，常常暴露出侵

略和征服的意圖。以「動力橫決天下」的西潮，雖然為人類開拓了史無前例的繁榮勝境，但也為人類甚至一切生靈帶來了危機。社會達爾文主義所顯示的競爭哲學不能為二十一世紀提供和平互惠的生存之道已成為東西方有識之士的公論。



我們既是啟蒙的受惠者又是啟蒙的批判者。作為受惠者，我們不僅要珍惜這份遺產還應發揮其創造轉化的功能，進一步為理性精神如何在中國文化的土壤裏播種生根而努力；作為批判者，我們不僅要剖析西方人文主義的曲折內容而且要針對因人類中心主義和科學主義瀰漫全球所造成的危機探求解救的方案。因此，我認為「救亡壓倒了啟蒙」的提法不夠全面。強調應以補課的方式，繼承「五四運動」時期以開放的心靈向西方學習是有現實意義的：市場經濟、民主制度、科學技術，乃至自由、人權、個體人格的解放以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信念都是中國文化所缺少的現代價值。

以學步慢行戰戰兢兢的嚴肅態度重新認識啟蒙是責無旁貸的文化事業。可是把啟蒙精神不能在中國土壤裏播種生根歸罪於救亡的迫切感卻沒有很大的說服力。如果救亡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共同背負的十字架，那麼由屈辱、悲憤、內疚、傷心種種情緒所交織而成的迫切感則是我們每一個人必須忍受的痛苦。在迫切感的煎熬之下，以學步慢行的危心，採取哀兵的策略，作動心忍性的工夫是向現代西方學習啟蒙精神的唯一途徑。

今天，面向二十一世紀，啟蒙心態的弊端有目共睹。我們除了要忍耐救亡的迫切感以平常心來進行啟蒙的補課，還得從根源處對現代西方文明作全面而深入的反思。以此為背景，發掘傳統資源不只是民族再生的課題也是人類自救的當務之急。啟蒙心態（特別是人類中心主義和科學主義）為一切生靈所帶來的危機要靠世界各地的精神文明來化解，基督教、回教、佛教、猶太教、興都教、道教乃至巫教、神道，和民間宗教既然都有傳統資源可以提供，儒家的人文精神當然也有滋養現代心靈的源頭活水。

杜維明

美國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及哲學教授
夏威夷東西文化與傳播研究所所長